2026年11月24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/李磊明
电子信箱/llm@cnnb.com.cn
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

编者按：

着力赓续中华文脉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。浙东学术是中华学术版图中极具思想张力与历史深度的地域传统。自王阳明倡“致良知”之教，以心学革新理学；至刘宗周本慎独而辨学术，深刻总结和修正心学；黄宗羲、万斯同师徒于鼎革之际以文献存亡继绝，开创浙东史学新局；全祖望、邵晋涵承流接响，使浙东学术从地方传统升华为全国性学术范式。千年文脉，代有传人，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的治学宗旨、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品格、“文献传承”的文化担当，不仅形塑了浙东学术的精神气质，更对当代文化建设深具启示意义。本版组织刊发的4篇文章围绕“浙东学术的文脉与当代价值”主题，以历史纵深观其流变，以古今对话发其新声。

赓续浙东学术文脉 赋能文化强市建设

——从历史学脉中挖掘城市精神的时代力量

童 杰 吴建胜

1916年，孙中山到访宁波，在省立四中（今宁波中学）发表演说，高度评价甬商：“凡吾国各埠，莫不有甬人事业，即欧洲各国，亦多甬商足迹，其能力之大，固可首屈一指也。”世人多见甬商驰骋四海的经商才干，却常忽略这份开拓魄力背后深厚的思想根脉——浙东学术。谈及浙东学术，通行说法常上溯至南宋陈亮、叶适的事功之学。但严格而言，具备清晰师承、共同学术宗旨、稳定地域集聚与自觉学派认同的浙东学派，真正成形于明清之际：黄宗羲开其宗，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前后接力，绵延近三百年。梁启超、章太炎、何炳松等学者重新发掘浙东学术传统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系统阐发现代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，推动这一地方学脉进入全国学术视野。

一条用生命书写的学脉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浙东学术》有言：“浙东之学，虽源流不异，而所遇不同，故其见于世者，阳明得之为事功，蕺山得之为节义，梨洲得之为隐逸，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。”同一学脉在不同学人身上绽放不同光彩，共同根基是面向家国天下的道德担当。

衡量一个学派是否为真实学术实体，关键看四点：明确的师生师承、共同学术宗旨、稳定地域空间、后代学人的自觉认同。从学派概念史的角度看，“南宋浙东学派”并非当时即有的定名，而是后世学者梳理地域学术脉络时，逐步回溯建构起来的谱系叙事；明清浙东学脉则四条标准全部具备，是真正意义上自觉形成的学派传承。

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开创者：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人，遭阉党迫害，他十九岁赴京申冤，当庭锥击仇人；明清鼎革之际，集结“世忠营”抗清，兵败后拒绝清廷征召，隐居著述讲学。他虽不仕清，却支持子黄百家、弟子万斯同参与《明史》纂修，以“存一代之史”守护文化根脉。

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修史，不署衔、不受俸，成为《明史稿》核心编撰者，梁启超称“《明史》虽有相当价值，万氏力也”。私淑黄宗羲的全祖望，一方面以《鲒埼亭集》为明末志士立传，将气节纳入学术脉络审视；另一方面续修《宋元学案》，接续学脉谱系。

鄞县志士张煌言虽不以学术名世，但其舍生取义的家国气节，与浙东学人精神遥相呼应，是宁波重要的文化符号。浙东学人的道义担当，始终落实在乱世抉择、文献守护与学脉接续之中。

道义担当：浙东学术的精神底色

当下谈及浙东学术，“经世致用”已是共识。经世致用回答“学术用来做什么”，道义担当回答“学术为谁而做”，二者相辅相成。事功之学若缺少道义约束，易滑向工具化、功利化；浙东学人始终将经世实践锚定于天下生民的价值立场。

浙东学人崇尚的节义，并非对君主的愚忠，而是以天下生民为根本的公共责任。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批判君主专制、高扬民本思想，立足点正是“天下”的公共利益，而非一姓王朝的私利。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中指出，史志的教化功能，正在于传述忠孝节义，使“怯者勇生，贪者廉立”。一个学派若只停留在知识生产，只是知识共同体；唯有融入精神坚守，方能成为生生不息的精神共同体。

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力，让浙东学脉代有传人：从黄宗羲开宗，经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邵晋涵、章学诚，下至晚清黄式三、黄以周父子，绵延不绝。

激活浙东学脉：宁波文化强市建设的精神滋养

浙东学派不是后世堆叠的文化概念，而是明清之际学人用学问、气节与生命践行的真实学脉。传承这份遗产，不能只当作城市宣传的标签，更要把握其重史、经世、担当为民的精神内核。为此，传承浙东文脉，要打通文献研究、精神转化、社会赋能三个环节，实现从古籍文本到城市现实的落地，赋予古老学脉新的时代表达，为宁波文化强市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。

一是厘清边界，夯实学术根底。依托宁波大学中国史学科、浙东文化研究院、天一阁博物院等平台，系统整理明清浙东学人文献。首要做好概念辨析：厘清“地域学术传统”与“严格意义上的学派”的界限，还原明清浙东学派的独立形态，改变不加辨析上溯南宋的通行叙事。平衡文献整理与大众普及，既推出通俗读本，也产出严谨成果，为公共文化传播提供学理支撑。

二是转译精神，讲好城市叙事。跳出罗列古人轶事的模式，将浙东学术“经世致用、重史求实、以天下为念”的内核，转化为当代可感知的城市精神：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、重诺守信的道德品格、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。用好四明山黄宗羲遗迹、天一阁等文化空间，通过展览、讲座、研学等形式，让典籍走出书库，推动浙东学术精神融入城市品格。

三是文化赋能，对接发展实践。浙东学术本以“经世”为要义，传承的落脚点在服务当下。经济领域，从其务实守信的价值取向中汲取启示，对接宁波商帮传统与工匠精神，倡导实业为本、诚信经营；社会治理领域，借鉴其关注民生的治学取向，涵养崇文重教、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；文化育人领域，将求实担当精神融入德育与科普，引导青年读懂本土思想传统，让古老学脉真正融入城市发展实践。（本文系2026年度宁波市战略合作平台预立项课题“明末清初浙东学人的文献积累与史学构建”研究成果）

（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宁波大学团委公益实践中心主任）

明末清初浙东学人的文献积累与史学构建

蔡霁安 方禧东

明末清初，江山鼎革，学风丕变。晚明学者空疏游谈的积弊日渐凸显，一股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思潮悄然兴起，浙东学派登上了学术舞台。以黄宗羲、万斯同师徒为代表的浙东学人，摒弃空谈义理的浮躁风气，立足文献搜集与整理，以史学反思观照世事。他们秉持“国可灭，史不可灭”的核心信念，深耕明史整理与编纂，完成了从史料积累到构建系统史学体系的学术转型，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。

作为浙东史学的开山宗师，黄宗羲的治史之志与存史使命，既根植于家学熏陶与年少积淀，亦因乱世国变得以坚定升华。他自幼广读典籍。青年时，其父黄尊素告诫他“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”，命他研读《国朝献征录》，由此黄宗羲确立了潜心治史的志向。之后他通读明代十三朝实录与二十一史，在史籍之中体悟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关系。国变之后，黄宗羲隐居山野，将修史存史视为毕生使命。

据考证，黄宗羲留存著作共120余种、1300余卷，总字数逾两千万。这般庞大的著述成果根植于他长期广泛搜集史料的努力。他先研读家藏旧籍，又四处寻访、购求流散古籍，曾购入钮氏世学楼藏书十余册，还与钱谦益相约共读绛云楼藏书。祁氏旷园藏书散佚时，黄氏曾随同书商收集十余捆典籍，其中不少史籍是难得一见的珍本。为妥善保存这批文献，他建造续钞堂庋藏典籍，为后续史学研究筑牢坚实的资料根基。针对明代文献真伪混杂、体例散乱的乱象，黄宗羲秉持求实的考据理念，逐一校勘辨伪、去芜存菁，搭建起体系化的明代文献资料库。这批文献既是其史学研究的核心根基，也彰显出浙东史学重实证、尊史料的治学特质。

在系统整理明代文献、考究历代治乱脉络的过程中，黄宗羲突破单纯辑录史料的局限，秉持经世致用思想，以史鉴今、针砭时弊。其早期著作《留书》初步承载其治世思考，后经不断增补修订，最终凝练为《明夷待访录》。全书二十一篇，深度覆盖君权体制、土地制度、宦官弊政等议题，借《周易》“明夷”卦寄寓乱世守志、静待时变的心志。该书将史学考据与现实批判相结合，集中彰显黄宗羲的历史反思与治国理想，是浙东史学以史论政的代表作品。相较于政论性著述，《明儒学案》填补了传统学术史书写的体例空白，是黄宗羲梳理明代学术脉络的集大成之作。全书六十二卷、分立十七个学案，形成案序、传记、语录三位一体的完备书写结构，通过概述学派源流、记述学人履历、辑录核心学术观点并加以评议，厘清明代诸学派的思想内核与传承脉络。这种以学派为核心的编纂范式，系统性重构了明代学术发展的脉络。

除原创论著外，黄宗羲依托文献汇编存续明代文脉。自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起，他耗时八年辑成二百十七卷《明文案》，又历经十八年增补打磨，最终修成收录四千余篇文章的《明文海》。全书以二十八类文体规整明代文本遗存，囊括奏疏、议论、碑记、辞赋等文体。其编纂并非简单罗列文献，而是刻意甄别筛选，挖掘世俗应酬文本中埋没的真情实论与真知灼见，以此留存明代社会与士人思想的真实样貌，四库馆臣对《明文海》评价甚高，誉其为“一代文章之渊薮”。

黄宗羲编纂史籍离不开师友与门生的协助。他自述编纂《明儒学案》时，由自己划分学派、考辨源流，“同门姜定庵、董无休操其大要，以著于篇”。在一众追随者中，弟子万斯同受其学术浸润最为深厚。师徒二人曾共同剖析明代科举制度弊病，万斯同由此深刻体悟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核心治学理念，主动摒弃浮华空泛的辞章之学，转向以经证史的治学道路，成为浙东史学最重要的传承者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受明史馆监修徐元文、总裁叶方霭延请，万斯同入京纂修《明史》。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，不受官禄，历时二十余年，广征明代邸报、奏疏、文集、野史与方志，通过文献互证勘辨史实，斟酌体例、人物评价与制度记载。

在浙东史学传承脉络中，黄宗羲搜集文献、革新史学、开创学派范式。万斯同、黄百家承其志向入局纂修《明史》，将零散史料整合为完备正史。浙东学人由此形成“存文献、治史学、明世道”的学术体系。这份穿越鼎革乱世的史家坚守，成为浙东学术留给后世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。（本文系2026年度宁波市战略合作平台预立项课题“明末清初浙东学人的文献积累与史学构建”研究成果）

（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系讲师、宁波大学中国史博士研究生）

清代浙东学派的文献整理与学术传承

孙 凯 陈晓敏

朱熹注“文献”有云：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”此语道破了学术传统绵延的双重基石：既仰赖思想创发与贤人行迹，更依凭典籍文献的沉淀与递嬗。人物生平的采辑、遗书旧籍的庋藏、散佚文字的辑佚，恰是将“贤”与“文”融合为一体的核心中介。宁波自古文风鼎盛、藏书成风，甬上名贤对清代浙东学术的助推，正为这种“文献”与“学术”交相滋养的历史图景，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察样本。全祖望与邵晋涵分属前后两代，治学场域亦有差异。全祖望立足乡邦，搜访旧籍、追考先贤遗事；邵晋涵进入四库馆，在汇聚天下典籍的国家文献工程中辑佚校雠。二人的文献实践由地方而及全国，显示出清代中叶浙东学术在整理旧闻、考信史实之中延续学脉并拓展治学规模的轨迹。

立足乡邦：在搜讨文献中建构学统

全祖望倾力于乡邦文献，却并不以表彰乡贤、夸饰桑梓为务。《辨大夫种非鄞产》最显其治学尺度。南宋以来，宁波志乘渐有越大夫文种为鄞人之说；然而全祖望稽考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等典籍，辨其籍贯源流，并直陈图经地志“扳援古人以为桑梓生色”之弊。地方记忆可以广收，能否传信则须经文献互证。

这种考信意识也见于《鲒埼亭集》所收碑传、序记、书院记等文字。全祖望于旧志、碑刻、家乘与先贤遗文之间钩稽线索，既记一人之出处行谊，也留意学术交游与地方文教的沿革；考其行迹，辨其师承，使许多散落于乡邦的学人事迹获得较为清晰的历史位置。集中有关明清之际遗民、甬上学人以及书院讲学的记述，也为后人追考地方学术留下了可资征信的材料。乡邦文献因而超出地方掌故的汇集，成为追寻学术源流、保存一地文化记忆的基础。

由人物故实的考辨进于《宋元学案》的补修，全祖望的文献工作又具有学术史建构的意味。《宋元学案》由黄宗羲发凡，黄百家续纂，全祖望踵事增修，广采诸家文献，增补学案，辨析师承，使前人未竟之业获得新的规模。以《士刘诸儒学案》为例，他将庆历前后散布于齐鲁、浙东、浙西、闽、陇、巴蜀等地的学者编次于宋学发展的脉络之中，并留意明州杨、杜诸子等早期学人的位置。原本分散在地域、著述与人物传记中的材料，由此被重新组织为可以追索的学术谱系。

从搜求遗文、考辨人物到编次学统，全祖望的实践贯穿着存史与考信两端。由此，整理文献遂不只是保存旧籍，也参与了学术传统的重新认识与建构。

进入馆阁：从地方藏书走向国家工程

及至乾嘉时期，邵晋涵面对的文献环境已有显著变化。四库开馆，天下典籍汇聚于朝，《永乐大典》中保存的大量佚文亦得到系统搜辑。文献整理的场域由乡邦旧籍扩展到国家级典籍工程，如何从浩繁材料中辑佚、校勘、辨明出处并恢复旧书，成为馆臣的重要工作。

邵晋涵深耕史籍整理，对史家保存文献有明确自觉。其《五代史记提要》有“史家以网罗放失为事”之语，所强调的正是搜罗散佚、保存史料。进入四库馆后，这一认识落实为大规模的辑佚与校勘实践，其中重辑《旧五代史》最具代表性。

薛居正等所撰《旧五代史》元明以后传本渐湮，所幸《永乐大典》保存不少佚文。邵晋涵等馆臣从《大典》各韵中甄录旧文，又参取《册府元龟》等书补其阙失，依原书卷数重新编次，并对篇章次第与文字异同加以勘订。进书表所谓“按代分排，随文勘订”，概括了这项工作由搜罗散佚、旁征群籍而至排比校订的过程。原本散落在不同典籍中的材料重新汇聚成书，使湮没已久的史籍再次进入史学知识体系，也为后世考察五代史事保存了重要依据。

由全祖望至邵晋涵，延续的是重搜讨、尚考信的治学取径，改变的则是文献整理的场域与规模。前者从乡邦旧志、碑传、家藏别集之间保存人物与学术遗迹，并通过编次使地方文献获得学术史意义；后者进入四库馆，将辑佚、校勘与考证施用于汇聚天下的典籍，并由地方性的文献实践延伸至全国性的典籍整理事业。

古为今用：推动藏书资源向当代知识资源转化

通观清代浙东学术，其传承脉络甚为清晰：既有思想义理的承续，亦有长期细密的文献实践。循此理路复观宁波之藏书文化与浙东文脉，其功用固不可专凭典籍庋藏之多寡以论长短。宁波世守不替之聚书、读采、精校与辑理地方故实之传统，最可贵者，在于使遗文旧籍源源不断地融入学术演进与新知阐发之中。庋藏回应存史之需，考据彰显致用之途。二者贯通融会，古籍始得摆脱束之高阁之命运，凝结为生生不息的学术血脉。

当今推动地方文献整理、典籍保护利用与学术传播，亦当以此为镜鉴。保护古籍，绝非仅止于物理载体之守护；整理文献，亦非仅止于排印出版之完成。唯有进一步考辨源流、抉发微旨，促使文献重返学术探索、文化涵育与社会认知之域，古籍蕴含之历史智慧方得以重新复苏。（本文系2026年度宁波市战略合作平台预立项课题“清代浙东学派的文献整理与学术传承”研究成果）

（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中国史博士研究生、宁波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）

浙东学术视野下的明代心学著述

杨 懿 韩佳露

从“甬上四先生”看浙东学术的心学传统

心学向来是浙东学术的核心主题之一，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《浙东学术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陆氏，而通经服古，绝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。”其中“三袁”为南宋时期鄞县籍学者袁燮、袁肃、袁甫父子三人，所谓“三袁之流”代指的就是由“甬上四先生”，即舒璘、沈焕、杨简和袁燮等陆氏心学门人开创的四明学派。

“甬上四先生”是第一代象山后学，而且在心学方面的建树和影响力，远远超过了陆九渊故籍江西的槐堂诸儒，因此素以“其学渊博无涯”著称的全祖望，在《宋元学案叙录》中云：“象山之门，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。”然其四人师承虽同出陆氏一脉，在具体的治学路径与思想阐发上却呈现出多元面向：舒璘提倡“心安”，而要抵达这一精神境界，就要始终秉持“居敬修己，勉焉不怠”的修身要求；沈焕认为“昼观诸妻子，夜卜诸梦寐，两者无愧，始可以言学”，强调将修身实践落实于日常家庭生活的治学取向；杨简肯定孟子的性善论，强调“人心皆善，皆可以为尧舜”，十分注重道德实践，于是在其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，往往以“以德化感人，民日悦服”为己任；袁燮认为“人心至神，无方无体，有如斯鉴，应而不藏”，所以其在出任国子祭酒之际，“延见诸生，必迪以反躬切己，忠信笃实为道本”。

如上所述，“甬上四先生”这种既宗奉心学本体而不悖于朱子之教，又强调心性与实务并举的学风，不仅奠定了四明学派在浙东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，更为后世浙东学者在处理心性之学与文献考据、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时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启示。

浙东学术视野下的王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

王阳明曾对湛若水指出：“慈湖（即杨简）远过于象山”，这一表述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王阳明对杨简学问的高度推崇，同时还深刻地折射出了阳明心学对慈湖心学的继承与发展。在阳明看来，陆九渊虽率先揭橥“心即理”的命题，开拓了心学的发展路径，但其相关论述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派辩难的属性；相比之下，杨简主张“不起意”，直指本心之自然流行与虚明灵觉，这种消解主客对立、直契本体状态的工夫路径，更契合阳明晚年所臻至之“致良知”学说。

此外，王阳明亦深受“和会朱陆”的浙东心学传统的影响，这在其著述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中有着集中体现。该书通过辑录朱熹晚年34封书信中反省早年“支离”之弊、趋向“简易”直截的言论，来论证朱子晚年思想其实已与象山心学殊途同归。这种诠释并非单纯的文献考据，而是阳明基于心学语境，对朱子学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化，表明心学并非背离正统，而是对儒家道统的回归与正本清源。这一做法既回应了当时学界对心学“空疏”“异端”的质疑，也为心学在浙东、江西、贵州乃至全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，彰显了阳明善于融通义理、不拘门户的学术特质。

刘宗周《阳明传信录》与浙东心学的返本开新

王阳明终身坚持讲学活动，其游历所至之处均开坛授业，吸引了大量士人投身门下问学，故而弟子遍布全国各地，且在发展中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学术分支。待到晚明时期，也就是阳明心学经过百年传播发展之后，不少传承阳明心学的王门后学，在对阳明心学的核心意涵与思想主旨进行阐释时，已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偏差，逐步流入了专尚玄虚、脱离实际的空疏禅学歧途。

刘宗周编纂《阳明传信录》这一学术工作，正是发生于上述王门学风偏失的背景之下。刘宗周长期以来与浙中王门后学的代表性人物陶奭龄、沈国谟、管宗圣、史孝咸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往，在往复论学的过程中，深刻地认识到，浙中王门之所以陷入空疏禅学的困境，关键就在于割裂了“意”与“知”及“心”与“性”之间本有的内在联系，将阳明所言的“良知”错误地理解为一种脱离具体道德实践的空灵知觉。因此，刘宗周提出将“慎独”与“诚意”作为救治良方，试图通过《阳明传信录》的编纂，来对阳明先生相关论述展开评点，以及对后学的各种不当阐释进行质疑，进而揭示阳明心学本有之真精神，从而将心学从玄虚的禅悟拉回到严谨的道德实践之中，实现了从“尊德性”向“道问学”回归的辩证统一，浙东心学也由此进入返本开新的发展阶段。（本文系2026年度宁波市战略合作平台预立项课题“明代浙东心学著述的生成与流传”研究成果）

（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副教授，宁波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）